

# 叙利亚穆兄会和真主党在叙利亚危机中的 经济网络比较： 基于宗教经济学的视角<sup>\*</sup>

申 浪 李福泉

**摘 要：**在叙利亚危机的动态演进中，宗教组织的意识形态叙事与经济行为的互动机制，不断形塑着冲突的复杂化和长期化格局，而宗教经济学为解析这一现象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危机中处于相互敌对阵营的叙利亚穆兄会和真主党虽同属宗教型非国家行为体，但双方经济网络在历史生成、组织形态、运行机制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导致在应对国际制裁时二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生存韧性与发展前景。二者经济网络的本质区别在于：叙利亚穆兄会的经济活动是对外部资源的“寄生性依赖”，其经济网络在叙利亚缺乏生产性根基，而真主党则将自身发展深深嵌入巴以冲突和美伊矛盾的结构性问题当中，其经济活动服务于“抵抗之弧”的整体利益，经济网络因而更具发展韧性。

**关键词：**宗教经济学 叙利亚危机 穆斯林兄弟会 黎巴嫩真主党 经济网络

**作 者：**申浪，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 2025 级博士研究生；李福泉，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基地研究员。

肇始于 2011 年的叙利亚危机打破了巴沙尔政权对本国经济资源的制度性垄断，碎片化的国家治理为非国家行为体承担部分国家职能提供了现实条件。在此背景下，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叙穆兄会）与黎巴嫩真主党（以下简称真主党）这两个分属“逊尼—什叶”教派谱系和不同政治阵营的重要伊斯兰组织，在叙利亚危机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并形成了差异化的经济网络。<sup>①</sup> 二者的经济网络不仅决定着各自的行动逻辑与扩张边界，也加剧了叙利亚国内的教派冲突，甚至在局部影响着叙利亚危机的发展走向。因此，深度剖析二者的经济网络不仅对探究非国家行为体至关重要，也对理解叙利亚危机的复杂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内外研究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多方面局限：学界多聚焦于冲突中单一宗教组织的外部依附关系与意识形态叙事，<sup>②</sup> 并无对其经济网络的专题分析，也无基于宏观经济网络而进行的比较研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世界宗教传播史研究”（项目编号：24VLS028）的阶段性成果。

① 经济网络是一个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交叉概念，指行为体为获取、管理和分配经济资源而建立的高度组织化系统。宗教组织往往将宗教信仰转化为经济资源获取的能力来构建社会网络。详见 Amy Reynolds, “Networks, Ethics, and Economic Values: Faith-Based Business and the Coffee Trade in Central America”,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48, No. 1, 2013, p. 119.

② 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有：朱传忠：《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的新动向》，《西亚非洲》2019 年第 3 期；李福泉、申浪：《黎巴嫩真主党与叙利亚关系探析》，《中东研究》2019 年第 1 期。国外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著作有：Raphael Lefevre, *Ashes of Hama: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Syr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Matthew Levitt, *Hezbollah: The Global Footprint of Lebanon's Party of God*,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24.

究,更缺乏从理论高度解构冲突环境下宗教组织生存发展策略的学术成果。宗教经济学的兴起为突破这些局限提供了理论可能。时至今日,经过数位学者的共同努力,<sup>①</sup>这一学科已形成能够清晰描述宗教与经济互动逻辑的叙事体系,其理性选择、宗教市场、俱乐部模型等核心内容,不仅能够诠释和平语境下的宗教与经济互动,更为理解冲突场域中宗教组织的经济运行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以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为分析工具,能够系统剖析并对比叙穆兄会和真主党在危机中差异化的经济网络,从而更深层次地理解宗教组织的自身发展以及这对叙利亚危机所产生的多维影响。

## 一、宗教经济学理论与叙利亚危机

宗教经济学的核心任务是解析宗教组织如何通过资源的有效配置来实现生存与发展。真主党和穆兄会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冲突中的发展动态,与宗教经济学核心理论内涵具有很高的适配性。

第一,宗教市场论与教派竞争。各宗教组织参与市场竞争的方法是相同的,都通过提供相对差异化的公共服务来吸引普通民众加入。这一争夺信众的社会逻辑间接作用于宗教组织经济网络的构建,这是因为追随者的加入与集聚为宗教组织提供了必要的发展资金和人力资源,进而长久地支撑其经济网络的运行。而缺乏国家监管的经济市场越自由,排他性宗教机构的优势就越大,宗教竞争的活力就越强。<sup>②</sup>具体到叙利亚危机的冲突环境中,逊尼派群体与阿拉维派群体进行了长期对抗,各自提供排他性的公共服务产品,形成了叙利亚宗教市场的阵营化。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或“努斯拉阵线”通过暴力手段宣传自身意识形态的方式不同,叙穆兄会通过提供基层服务来展示自身的温和形象,从而吸引对现状不满的叙北部青年加入该组织。得到伊朗战略物资供给的真主党,则通过强调泛伊斯兰主义和反压迫的“抵抗叙事”,向受到极端组织威胁的叙利亚什叶派社区提供部分基本的生活物资。

第二,理性选择与信众的宗教选择。信众的宗教选择是获取心灵慰藉、物质利益等实际回报后的理性结果,权衡成本与收益是信众从始至终的核心关切。<sup>③</sup>各宗教组织往往需要持续优化各自的公共服务产品来吸引信众。在叙利亚内战中,平民对某一宗教组织的实际选择基于能否获得必要的安全保护、物资援助等现实利益,教派认同只是少部分的考虑因素。例如,叙利亚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部分民众选择支持“沙姆解放组织”,是基于该组织能够提供最为基础的公共服务。反观同为叙北部阿勒颇地区的基督徒选择认可并支持巴沙尔政权,则是恐惧极端组织掌权后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叙利亚南部的德鲁兹派群体在2015年接受真主党提供的部分武器和军事训练,部分原因是本国巴沙尔政权的协调,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德鲁兹群体对极端组织扩张的担忧。

第三,宗教俱乐部与宗教纪律。大多数宗教组织通过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预设针对信众的加入门槛,来排除带有强烈机会主义动机的“搭便车信众”。<sup>④</sup>在得到合格成员后,宗教组织又通过

① 19世纪末,德国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系统论证宗教意识形态对经济贸易行为的形塑作用,这成为宗教经济学的思想源头。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突破信众进行宗教参与的感性假设,认为这是其利益权衡后的理性选择。1988年,凯文·墨菲进一步提出“理性成瘾”理论,在《社会经济——社会环境中的市场行为》中首次将“人力资本”理念嵌入宗教研究。1990年,劳伦斯·艾纳孔提出“宗教市场模型”,并于1998年推动美国经济学会设立宗教经济学的学科编码,这标志着宗教经济学正式成为独立的学科。

② Rodney Stark and Roger Finke, *Acts of Faith: Explaining the Human Side of Relig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 194.

③ Ibid, p. 85.

④ Laurence R. Iannaccone,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s of Relig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36, No. 3, 1998, p. 1483.

持续的精神慰藉、社交机会和物质援助等集体福利作为现实回报，来提高成员的认同感与忠诚度，以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纪律性的同质型俱乐部。在叙利亚危机中，不同宗教派别纷纷制定严格教义来筛选出更忠诚的追随者，以扩大自身的组织化良性发展。例如，真主党通过严格教义和军事手段强化组织纪律，形成了数量庞大的高忠诚度组织成员，又以粮食分配的政策倾斜、较低的交易税等集体福利巩固了内部成员的组织认同，构建起“筛选—忠诚—福利—认同—再筛选”的良性发展循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表现得更为突出，该组织在创立初期就要求加入的成员遵守禁止音乐、性别隔离等规定，以减少“搭便车者”，并以控制区的油田走私收入为成员提供相对优质的生活服务。叙穆兄会则因分散化的组织网络和为获得逊尼派青年群体的支持，允许部分“搭便车者”加入，为在叙利亚的持续发展做准备。

第四，宗教人力资本与信众的组织依赖。宗教组织通过长期的意识形态传播（学校教育、宗教权威的道德感染等）会积累出具有高度思想聚合力的社会信众网络，即宗教人力资本。<sup>①</sup>而当个体信众对宗教组织投入的时间、金钱和情感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组织粘性”，即对宗教组织的高参与度和强依赖性。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中存在众多具有极端主义倾向的逊尼派成员，其难以转向温和立场的原因在于接受了长期的意识形态教育。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中所谓的“圣战儿童”，从8岁起陆续接受密集的宗教教育和严酷的军事训练，并通过间接参与战争的方式来塑造和强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价值观，形成高度认同和依赖该组织的最终结果。真主党士兵在叙利亚危机中的战斗能力与纪律意识远超叙政府军，一个重要原因是该组织对士兵进行了参战合法性的多方面思想灌输，如保卫什叶派圣墓宰娜卜、反抗以色列等等。

综上所述，宗教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对于分析和理解叙利亚危机中的宗教组织具有显著的价值。这是因为这些组织的生存逻辑都是将宗教的精神力量转化为源源不断的物质资源，符合宗教经济学中宗教与经济互动机制所要阐述的核心命题。从叙危机发生的教派背景来看，宗教组织能够进行民众动员的先天条件是叙利亚存在教派间权力争夺的“历史积怨”：统治集团阿拉维派长期的权力垄断催生着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群体争取国家权力的持续反抗，合法手段的失败又使逊尼派群体将斗争路径异化为暴力方式，由此导致叙利亚出现持续不断的恶性暴力冲突，这使外部势力的干预理由“护教促平等”变得理所当然，叙利亚冲突随之加入教派博弈这一重要的“冲突底色”。叙穆兄会和真主党又得以利用冲突的教派特性，选择依赖或动员各自的内外资源，国际社会为解决危机而商讨的各项和解方案就变得更加难以落实。而要理解二者除教派因素外能够延续冲突的底层逻辑，就必须从各自的经济网络入手进行深度分析。

## 二、寄生性依赖：叙穆兄会在叙利亚危机中的经济网络

叙穆兄会在叙利亚的发展历程具有曲折性和复杂性的显著特点。而从历史维度回溯叙穆兄会在叙利亚的经济活动，是理解叙利亚危机中该组织经济网络的重要基础。

叙穆兄会诞生于1945年，最初是由宗教慈善组织合并而来。<sup>②</sup>1945—1982年为该组织的“内生性”融资期。此时该组织主要依托天课和本地逊尼派商人捐赠来获取资金，随后在当地创办伊斯兰学校和兴建医疗诊所。<sup>③</sup>这种资金利用方式符合“宗教俱乐部”理论的核心内容，即通过宗教义务获取物质资源，又以社会服务作为集体福利来吸引新成员的加入。这支撑着该组织早期的民意基础和良性发展。1963年复兴党政权上台后对叙穆兄会进行了系统性打压，1965年还

① Laurence R. Iannaccone,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s of Relig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36, No. 3, 1998, p. 1481.

② Rawia Altaweel, “Syria Muslim Brotherhood After the Arab Spr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plomacy*, Vol. 7, No. 3, 2019, p. 94.

③ Dara Conduit,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Syr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71.

颁布《宗教组织管制法》，禁止宗教组织公开募集资金。<sup>①</sup>这体现出国家通过限制宗教组织的资金募集能力，加强了对宗教市场的干预。叙穆兄会由此转变思路，开始接收外部逊尼派力量的资金援助。1967年后沙特大幅增加对中东伊斯兰组织的资助，叙穆兄会获得的资金显著增长。<sup>②</sup>同时，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对叙穆兄会也进行了大力支持，包括提供军事训练、武器装备、资金和情报支持。<sup>③</sup>在获得外部援助后，该组织利用宗教慈善网络为其成员提供低息贷款与创业资金等经济支持，以对抗阿萨德政府的经济边缘化政策。这既有效规避了政府监管，又通过社会福利方式强化了成员的组织认同，与理性选择理论的“成本—回报”逻辑相同。

1982-2011年是该组织的“海外流亡”融资期。1982年“哈马起义”失败后叙穆兄会的经济活动完全停止，流亡海外的组织成员除在当地开办企业获得发展资金外，还依赖海湾国家附有政治条件的临时救济。1990年，阿萨德政府的宗教政策有所放宽，流亡的叙穆兄会骨干意图在叙利亚重建经济影响，派遣成员返回叙利亚，在叙北部开展纺织品和农产品为主的商业贸易。2000年巴沙尔上台后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并释放在监狱中的数百名叙穆兄会成员。<sup>④</sup>叙穆兄会抓住机会，通过参与私立学校建设、兴建慈善诊所、成立逊尼派商业协会等方式渗透叙利亚社会。但受制于叙政府的全方位监管，该组织的社会服务未形成规模，覆盖人口局限于叙北部的部分逊尼派社区。总体来看，2011年之前，叙穆兄会在叙利亚的发展缓慢，并无制度化的经济管理和运行网络，这与逊尼派在复兴党威权统治下的边缘地位密切相关。

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叙穆兄会迎来“黄金期”，其经济网络最终形成。随着巴沙尔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不断减弱，该组织在叙利亚的经济活动逐渐恢复。外部逊尼派势力策动叙利亚政权更迭、遏制什叶派阵营扩张的现实需求，又使该组织成为逊尼派国家实现叙利亚战略的重要工具，从边缘政治组织迅速成为叙反对派中的核心力量。2012年，叙穆兄会在反对派联盟“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的席位中至少占据了四分之一。<sup>⑤</sup>在资金募集方面，该组织获得了部分海湾国家全方面的资金援助。卡塔尔的援助最为典型，其通过半岛电视台的宣传将叙穆兄会塑造为“民主代言人”，从而间接降低该组织的融资成本。卡塔尔以年均数十亿美元的持续资助成为叙穆兄会在内战初期的最大外部金主。<sup>⑥</sup>

此时叙穆兄会经济网络的组织结构呈现出显著的层级特征，首次出现本土化的经济管理架构。其核心决策机构为“协商委员会”（Shura Council），决策的具体落实由执行办公室负责，“救助委员会”（Relief Committee）统一规划资金在军事和社会服务方面的使用比例。<sup>⑦</sup>在决策过程中，叙穆兄会遵循协商的伊斯兰传统，这是由于逊尼派跨国网络的分散特性使集中化管理难以落实，也因规避制裁的现实需求使“化整为零”策略更能适合组织发展，但这导致经济决策分散化，地方武装的自主性过大。其地方武装指挥官普遍截留捐款所得资金和成员会费，该组织为此成立“审计委员会”来加强内部财务监管，但效果十分有限。此外，协商传统也缺乏执行决策的强制力，再加上当地部落利益与叙穆兄会整体利益的对冲，共同造成该组织决策和执行效率低下的结果。该组织难以将政治影响力有效转化为战场执行力的客观事实，使其在应对快速变化的战场局势时往往反应迟缓。

在应对国际制裁方面，叙穆兄会进行了一系列努力。一方面，该组织在控制区内大力推行非主流

① Rifai Rana, "The Sunni Religious Establishment of Damascus: When Unification Creates Divisi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20, p. 2.

② Dara Conduit,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Syr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142.

③ Ibid, p. 136.

④ Rawia Altaweel, "Syria Muslim Brotherhood After the Arab Spr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plomacy*, Vol. 7, No. 3, 2019, p. 95.

⑤ Ibid, p. 97.

⑥ Anne Marie Baylouny and Creighton A. Mullins, "Cash is King: Financial Sponsorship and Changing Priorities in the Syrian Civil War", *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 2017, p. 9.

⑦ Raphael Lefevre, *Ashes of Hama: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Syr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89.

的汇款系统“哈瓦拉”(Hawala)。在土耳其、约旦和叙利亚等国,最少存在数百名为叙穆兄会服务的专职经纪人。2020年,通过该系统至少转移了1亿美元。<sup>①</sup>叙穆兄会还受到“沙姆解放组织”的影响,将现代技术引入了传统金融体系,试图推行数字化货币。<sup>②</sup>另一方面,该组织努力发展非正式经济。珍贵药品和小麦、蔬菜等农产品的走私在土叙边境完成,走私收益与土耳其进行共享。叙穆兄会还通过在叙北地区垄断相对稀缺的公共服务(学校教育、医疗服务、难民安置等)进行“去极端化”实践,这构建起“福利换忠诚”的社会控制链条,使民众产生对该组织的高度依赖感和认同感。

随着2015年战场局势的逆转,叙穆兄会的经济网络迅速衰落。2015年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局势后,叙穆兄会影响下的反政府武装逐渐丧失众多战略要地。巴沙尔政权随即切断叙土边境的走私通道,叙穆兄会所依赖的边境黑市贸易迅速衰落。其经济网络开始由土耳其托管以换取后者的政治支持。2019年土耳其军队控制了伊德利卜省西部,形成地方武装和土耳其代理人分享物资分配权的局面,该组织的经济控制权遭到进一步削弱。2019—2023年,由于推翻巴沙尔政权在很多逊尼派国家看来已绝无可能,叙穆兄会的利用价值在迅速降低,最终被更有实力的“沙姆解放组织”取代主导地位。巴沙尔政权被推翻后,该组织被朱拉尼为首的逊尼派新政府排挤出政治和解进程。叙穆兄会从内战初期反对派中的核心组织沦为当前的边缘角色,深刻印证了“宗教组织的教派背景与外部支持结构决定着经济网络形态和效能”的宗教经济学理论内涵。

### 三、集权化管理：真主党在叙利亚危机中的经济网络

2013年5月,真主党公开宣布军事介入叙利亚内战,其经济网络也随之显现。而从历史维度回溯真主党在叙利亚的经济活动,对理解叙利亚危机中该组织的经济网络十分关键。

1982—2011年为真主党在叙利亚经济网络的“顺利成长期”。叙危机爆发前,真主党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于黎巴嫩国内,在叙利亚的经济活动以军事补给为主、走私贸易为辅,叙政府帮助真主党实现了资金来源的多样化。这一时期的叙政府在与真主党的关系中处于显著的优势,前者借助后者寻求与以色列的战略平衡并影响黎巴嫩的国内政治,后者则依赖叙政府的默许与协调,使其能够将叙领土作为接收伊朗物资援助的关键通道。真主党“4400部队”主要负责将伊朗的武器和资金援助从叙东部输送至黎巴嫩中部,黎巴嫩贝卡谷地成为叙政府和真主党之间的金融纽带。真主党运行的跨境走私网络也开始出现。叙政府在燃油方面的补贴政策让真主党看到了商机,其在叙利亚低价采购原油后,立即通过边境隧道走私到黎巴嫩南部进行高价出售。<sup>③</sup>该组织还与叙东部的部落力量合作进行部分油田的开采,随后通过伊拉克将石油运送至伊朗境内进行交易。叙利亚地方官员获得利益分成后的政策支持是确保走私活动实现的关键因素。<sup>④</sup>总体来看,2011年之前,真主党在叙利亚的经济活动十分有限,叙利亚政府的默许和庇护是其能够开展相关活动的前提条件。这一阶段该组织在叙利亚的战略目标是加强自身力量,并服务于伊朗构建的“抵抗之弧”的整体利益,而非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叙利亚危机爆发后,真主党在叙利亚的经济网络迅速发展成熟,这体现在资金来源、网络形

① Joshua Levkowitz, “The Hustle of Syrian Hawalas”, *The Institute of Current World Affairs*, 2021, <https://www.icwa.org/syrian-hawalas/>, 2025-6-16.

② Audrey Alexander and Teddy MacDonald, “Examining Digital Currency Usage by Terrorists in Syria”,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Vol. 15, Issue 3, 2022, p. 28.

③ David Daoud and Ahmad Sharawi, “Analysis: Hezbollah’s Unit 4400”, *Long War Journal*, 2024, <https://www.longwarjournal.org/archives/2024/11/analysis-hezbollahs-unit-4400.php>, 2025-11-12.

④ Ben Hubbard, “On Syria’s Ruins, a Drug Empire Flourishes”, *The Irish Times*, 2021, <https://www.irishtimes.com/news/world/middle-east/on-syria-s-ruins-a-drug-empire-flourishes-1.4747876>, 2025-11-12.

态和制裁应对三个方面。

首先，此时真主党的资金来源呈现出显著的多样性，不同渠道的资源获取又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一是通过区域控制所获得的资源掠夺收入。叙内战初期，真主党协助叙政府军收复关键城市，其经济活动表现为从叙黎边境输送武器、药品和燃料，以保障前线的物资供应，这初步建立以军事需求为导向的经济网络。随着战局的胶着，该组织的经济活动开始向资源控制方向倾斜，以服务于在叙利亚的长期发展。真主党在叙利亚每控制一块区域，就立即成立“经济管理委员会”，负责统筹影响范围内的资源开发，这体现出军事行动与经济控制的高度协同。二是伊朗对其系统性的持久援助。自真主党成立时起，伊朗就将其视为干预巴以冲突、扩展什叶派影响、实现地区抱负的战略工具，资金援助从未中断。中东剧变以来，伊朗更加奉行依赖代理人的“前沿防御战略”，通过圣城旅的军事物资运输、国内宗教人士捐赠和跨国贸易公司对接三种方式，伊朗为真主党注入资金年均数亿美元。三是真主党进行“抵抗叙事”宣传与实践而获得的募捐收入。2011年以来，真主党以保卫叙利亚宰娜卜圣墓和支持殉道者为核心宗教叙事，在中东乃至全球什叶派聚集区广设捐款中心。在捐款过程中，工作人员通过放映具有强烈代入感的烈士事迹纪录片，<sup>①</sup>传播具有强烈什叶派历史悲情主义和反抗精神的“殉道文化”，又向捐赠者回馈烈士纪念章和去什叶派圣地朝圣的优先权承诺，这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每年集资数千万美元。

其次，此时真主党经济网络的形态呈现出垂直化的层级管理结构。最高经济决策部门是总书记纳斯鲁拉直接领导的“经济事务局”，对叙战场的资金审批拥有绝对监管权。区域控制层是设立在大马士革的“抵抗经济委员会”，由纳斯鲁拉的表弟全权负责。<sup>②</sup>贝鲁特总部会将对接的伊朗援助分拨运至叙利亚，由该委员会统一分配。基层执行则依靠当地商业精英和各个真主党武装团体，前者负责评估当地资源的可榨取限度，后者则通过设立市场监管队来运行更为细致的经济活动。通过将军事指挥体系的层级化、标准化模式应用于叙利亚的经济与社会项目管理，该组织的决策执行迅速、资源动员高效。真主党还会进行经济部门工作人员的严格筛选。各级经济部门的核心管理者需要具有什叶派经学院学习经历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训练背景。

最后，为应对制裁，真主党建立了多元的货币交易体系和复杂的跨境隧道系统。与叙穆兄会规避制裁的方式相同，真主党也使用“哈瓦拉”系统，来自黎巴嫩侨民的数十亿美元通过该途径流入真主党。而得益于伊朗的技术指导，真主党更倾向于使用比特币或门罗币这样加密程度更高的电子货币进行跨境转账。此外，真主党在叙黎边境修建了用于规避制裁和防止空袭的隧道运输系统。2011年以来，叙黎边境存在至少数百公里的跨境隧道，分为运输武器装备的进攻性隧道和民生物资的基础性隧道，由真主党“4400部队”负责运作。<sup>③</sup>尽管隧道持续遭受以色列的空袭打击，但都难以被完全摧毁，真主党具备在短期内修复并新建备用隧道的能力。

#### 四、差异化韧性：叙穆兄会和真主党经济网络比较

总体来看，叙穆兄会和真主党在叙利亚危机中均构建出相对成熟的经济网络。结合宗教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可以得出两大组织经济网络最为核心的三方面异同点。

① Kendall Bianchi, “Letters from Home: Hezbollah Mothers and the Culture of Martyrdom”,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Vol. 11, Issue 2, 2018, p. 21.

② Camilleri and Castaneda, “Hezbollah’s Business Affairs Component”, *Grey Dynamics*, 2021, <https://greydynamics.com/hezbollahs-business-affairs-component/>, 2025-7-17.

③ Tal Schneider, “Expert: Hezbollah has Built a Vast Tunnel Network Far More Sophisticated than Hamas’s”, *The Times of Israel*, 2024,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expert-hezbollah-has-built-a-vast-tunnel-network-far-more-sophisticated-than-hamass/>, 2025-6-20.

表1 真主党和叙穆兄会的经济网络比较

理论维度	共同点	真主党的实际体现	叙穆兄会的实际体现
宗教市场与资源竞争	产品供给：意识形态传播和社会服务争取信众。 市场策略：暴力或排他性教义与对手竞争。	垄断性供给：依托跨国市场，以军事化实现资源垄断。 俱乐部模型：加入高门槛筛选成员，减少“搭便车者”。	竞争性供给：与其他逊尼派武装争夺信众，协商传统。 低门槛参与：发放福利吸纳成员，允许“搭便车者”加入。
理性选择与成本收益	降低成本：将走私、掠夺等行作为包装为宗教义务。 制裁应对：根据外部制裁压力调整资金获取方式。	绑定“抵抗”：石油走私是保卫圣地的经济努力。 长期投资：伊朗援助维持高军事投入，侧重社会服务。	短期目标：以推翻巴沙尔政权为筹码换取外部资源。 生存导向：依赖卡塔尔、土耳其等国的短期资金。
宗教资本与内部管理	跨国资本流动：各自的跨国教派网络提供资源。 权威效应：依托宗教学者强化行动合法性。	垂直化网络：刚性联盟，资金流动受伊朗直接影响。 集权式管理：通过“法基赫监护”集中经济决策权。	扁平化网络：各层级独立性强，与他国逊尼派力量联系松散。 自主性竞争：外部资金分散流入，内部形成各个派系。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

从以上表格中可以看出，叙穆兄会的经济网络具有脆弱性。这突出体现为资助方资助政策的投机特征。卡塔尔对其的支持具有短期利益权衡的显著色彩。出于和沙特争夺对叙利亚事务话语权的需要，卡塔尔向叙穆兄会提供了上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并要求将援助用于在叙利亚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民众动员，但在缺乏有力监管的情况下，叙穆兄会将资金用于购买土耳其的武器。这样的“资源错配”叠加腐败盛行，使叙穆兄会控制区“怨声载道”。卡塔尔对此极为不满，援助意向大为减弱。2017年，卡塔尔暂时停止对叙穆兄会的资助。

沙特和土耳其的支持则呈现出更强的波动性，两国因推翻巴沙尔政权的需要向该组织提供大量武器和资金援助，但当俄罗斯介入局势后，两国立即减少投入并寻求与俄伊两国的谈判。高度依赖外部援助制约着叙穆兄会的长远发展。一方面，该组织的决策自主权在外部干预下不断丧失。土耳其因担忧本国库工党与叙库尔德人的联动，迫使叙穆兄会影响的武装放弃与库尔德人的合作。沙特则因快速推翻巴沙尔政权的诉求，要求叙穆兄会将战略重心转到大马士革而非叙北部。<sup>①</sup> 这印证了宗教经济学的一大命题，即当宗教组织的经济网络过度依赖外部援助而非市场资源时，其战略自主性将被捐赠方的政治逻辑所裹挟。另一方面，外部因素使该组织的内部经济结构不断失衡，呈现出碎片化特征。外部援助资金主要流向军事领域，但民生等发展性投资受到严重挤压，叙穆兄会在叙北部的民意基础因而遭到削弱。该组织依赖多元金主也使其影响的武装分为土耳其系、卡塔尔系、本土系等，不断消耗着其内部凝聚力。

反观真主党，其经济网络在内外因素作用下具有较高韧性和运行效率。从外部来看，真主党与单一资助方伊朗的意识形态具有同质性，伊朗对其的援助也具有系统性和稳定性。从内部来看，真主党“中央集权式”的经济网络架构使各项决策更容易落实。真主党的经济网络对叙利亚经济也产生了双重影响。其通过提供社会服务和进行粮食走私，虽然维持了叙利亚部分地区的基本生活需求，但资源掠夺和黑市贸易的进行也威胁着当地的发展和稳定，实际上加剧了当地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而在地区层面，真主党的经济活动将伊朗的地区网络进一步投射到地中海周边区域，这压缩着沙特等海湾国家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影响力，不断重塑着区域经济格局。但随着中东局势的不断

① Yezid Sayigh, “Unifying Syria’s Rebels: Saudi Arabia Joins the Fray”,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3,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13/10/unifying-syrias-rebels-saudi-arabia-joins-the-fray?lang=en>, 2025-7-16.

变化，真主党在叙利亚的经济网络也面临发展困境。首先，单一援助方伊朗的国内困局。西方国家的长期制裁使伊朗的国内经济本就十分脆弱，持续投入物质资源支持中东什叶派力量又使其国内的经济更加发展更加停步不前。2024年伊朗总统选举后，新的领导层意图将资金使用的重点用于国内民生，对真主党的年度援助预算大幅减少。<sup>①</sup>其次，地区局势的显著变化。自2020年以来，以色列陆续精准清除了联结伊朗地区网络的多个关键人物，叙利亚的政权更迭也使真主党在叙利亚失去了政府层面的庇护，2025年发生的“伊以十二日战争”和2026年2月底开始的“美以伊冲突”，都使伊朗为首的“抵抗之弧”力量遭遇重大挫折，真主党在叙利亚的走私路线和基础设施也遭到以色列更加频繁密集的军事打击。最后，黎巴嫩国内的政治、经济现状也束缚着真主党。2020年以来黎巴嫩国内经济不断恶化，这迫使真主党将叙利亚的经济资源转至黎巴嫩以弥补资金缺口。在政治领域，2025年1月黎巴嫩结束两年的政治僵局而成立受西方认可的新政府，全面遏制真主党的发展势头已成为新政府的既定目标，黎巴嫩内阁甚至批准了解除真主党武装的方案。因此，当前真主党的战略目标是稳固其在国内的政治与经济地位，对叙利亚的关注和投入也将减少。

## 结 语

从理论视角来看，叙穆兄会与真主党在叙利亚危机中的经济实践及不同命运，是宗教组织作为理性行为体在面对冲突场域时形成的不同“资源适配”路径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两大组织在叙利亚经济网络的历史生成阶段，就已经呈现出曲折与顺利的显著差异，这预示着叙利亚危机爆发后二者对局势发展的不同影响。叙穆兄会经济网络的最大缺陷在于多元金主的支持投机性，海湾国家视其为遏制什叶派力量的低成本代理人，根据叙利亚局势的变化选择加强或者减弱对该组织的支持。该组织分散化的经济网络形态虽然具备较强的本土适应能力，但也容易在外部压力下产生分裂，从而降低该组织的整体实力。宗教合法性对其经济行为的掩盖和包装，也随着逊尼派多元教义的难以协调而变得苍白无力。民众在直观感受到社会福利减少之时，对该组织的认可和支持必然减弱。叙穆兄会的可替代性也体现在最新的叙利亚局势发展之中：当海湾国家意图与叙利亚新政府和解转而支持更加拥有民意基础的世俗化反对派之时，其被抛弃的命运就将无法改变。

尽管与叙穆兄会一样，真主党也面临来自多方面的挑战，但其经济网络具有“复合资本”的高度稳定结构：既有单一资助方伊朗的“刚性援助”保底，又有非法经济的巨大弹性空间，更有垂直化层级管理的快速决策，还有同质性“法基赫监护”理论的宗教整合。这使其能够在西方势力的不断制裁、以色列频繁密集的军事打击、逊尼派意识形态批判的多重压力下持续运作。只要伊朗仍然需要在叙利亚扩展影响力、巴以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叙利亚国内的教派问题未能妥善处理，真主党在叙利亚境内基于“抵抗叙事”合法性的经济活动将继续获得发展的土壤。

(责任编辑：李华伟)

<sup>①</sup> Toufic Chanbour, "Hezbollah Faces Bleak New Financial Realities", *Ai Majalla*, 2024, <https://en.majalla.com/node/323535/business-economy/hezbollah-faces-bleak-new-financial-realities>, 2025-6-20.